

厥部从不不是一个部族。

四、突厥汗国境内的乌古斯部西迁的一支入小亚细亚，长期与当地土著相融而成土耳其人，现代的维吾尔人和土耳其人虽同属操突厥语族，但它们在历史和血统渊源上毫不相干。

五、新疆古称西域，从来就不是“东突厥斯坦”，将“东突厥斯坦”对译成汉文的“东土耳其斯坦”，不是分裂主义的阴谋，就是认识上的糊涂。

【论 文】

奥斯曼帝国与现代土耳其官方关于“库尔德问题”话语的嬗变¹

咎 涛²

摘要：从历史角度看，奥斯曼帝国晚期和现代土耳其关于库尔德问题的话语经历了几个阶段性的变化。在奥斯曼帝国晚期，关于库尔德人的认知基本处于奥斯曼主义和伊斯兰的框架内，并不突出库尔德人独特的民族身份；在凯末尔主义主导的时代，土耳其官方主要是从同化库尔德人的角度刻意抹杀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并将库尔德问题主要视为发展问题以及国家安全问题。在当代土耳其，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曾明确提出一种“新思维”，区分国族认同和族群身份，承认库尔德问题和库尔德民族的存在，试图与库尔德工人党和解，实现停火并解决国内安全问题。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这一和解进程已然搁浅，当下土耳其对库尔德问题的话语又回到了以国家安全议题优先的立场上。

关键词：土耳其；库尔德问题；话语；凯末尔；埃尔多安

一、前 言

无论是从媒体呈现还是从个体观感的角度，人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库尔德问题对土耳其国家政治发展进程的重要性，可以说这是该国的核心问题，是自1984年以来使近4万人丧生、耗费了土耳其巨大财政收入的重大政治问题。³ 本文的落脚点不是讨论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政治与历史过程，而是尝试初步且概括性地讨论自近代以来，也就是奥斯曼帝国晚期和现代土耳其国家层面围绕所谓“库尔德问题”（Kürt sorunu）的话语（discourse）转变⁴。

¹ 本文刊载于《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6期，第3-24页；原文发表时有删减，这一版本在原完整版基础上略有修订。

²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

³ 数据可参见李秉忠：《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0-21页。库尔德人是中东第四大族群，是一个典型的跨境民族，其对土耳其国家的威胁是最大的。Muhittin Ataman, “Özal Leadership and Restructuring of Turkish Ethnic Policy in the 1980s,” i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8, No. 4, October 2002, p. 123.

⁴ 就土耳其国家层面的“库尔德问题”话语研究来说，土耳其社会学家麦苏特·严教授的作品最具代表性。严教授将土耳其在“库尔德问题”上的话语置于宏大的民族国家建设和发展问题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反驳了一种陈规陋见，即土耳其有意识地“遮蔽”了库尔德认同。他从话语形成的角度提出，土耳其并不是在理性地、自主地实践着其针对库尔德人的政策/话语，毋宁说，土耳其是在一个从传统的马赛克化的、多元-普世主义的帝国向中央集权化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蜕变过程中，在一个从落后的传统东方国家向一个西方化的、欲达到当代文明水平的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在一个把分散的人口凝聚为一个同质化的人民的过程中，处理库尔德问题、发展出其关于库尔德问题的不同话语的。也就是说，土耳其不是就库尔德问题而处理库尔德问题，库尔德



福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年) 的话语理论认为, “话语是由一组符号序列构成的, 它们被加以陈述, 被确定为特定的存在方式”¹。在福柯看来, 话语不只是涉及内容或表征 (representation) 的符号, 而且被视为系统形成种种话语谈论对象的复杂实践。也就是说, 虽然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 但话语问题不仅仅是运用特定符号指称事物那么简单, 而是涉及更多亦更为复杂的关系与实践, 话语理论就是要揭示和描述这种复杂性。² 福柯的话语分析着力于分析话语的对象、陈述、概念与主题选择等是如何进行的, 它们的顺序、对应、位置、功能和转换是怎样发生的, 进而揭示隐藏其后的权力—知识共生关系。³

在土耳其, 尽管“库尔德问题”很重要, 但长期以来它并非一种明确且客观的存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至少存在两个层次: 一是客观意义上的库尔德问题, 即认定库尔德问题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客观存在, 进而从现实问题的不同角度去切入和讨论; 二是主观意义上的库尔德问题, 即对所谓“库尔德问题”的认知。对某个问题的认知不可避免地会表现为对相关问题的不同视角的看法和话语, 这些话语不只是对所谓客观存在的“库尔德问题”的符号性表达, 更为重要的是, 它通过某种符号/话语建构起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权力—知识关系。在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上, 这表现为握有更多权力 (包括话语权) 的主流社会对“库尔德人”与“库尔德问题”的认知、建构和处置。也就是说, 话语必然会反映出主体力图以何种方式或政策来对待和处理客体, 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 (实践) 或说 (表述)。因而, 关于“库尔德问题”的不同话语本身就是历史性的、政治—权力实践的建构和表达。

从奥斯曼帝国时期到现在, 土耳其国内形成了多种关于“库尔德问题”的不同认识⁴和话语。对这些认知和话语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是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 因而, 本文仅从较为有限的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的观察、描述与分析。同时, 本文更为关注话语的转变而非具体的政策过程, 故选取了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进行详细分析, 对具体的事件和过程则作相对简略的处理。

二、19 世纪以前奥斯曼帝国史上的“库尔德问题”

库尔德人世代居住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⁵, 今天则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四个国家境内。从历史到现在, 库尔德人之间存在诸多差异。部落库尔德人和没有形成部落的库尔德村民之间在生活方式上显著不同; 库尔德语的两大主要方言之间差别很大, 无法沟通; 库尔德人还存在逊尼派、什叶派、耶济德人 (Yezidiler)⁶之间的宗教差别。经过民族主义的洗礼,

问题对土耳其来说并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问题。在这样的认识下, 研究土耳其针对“库尔德问题”的话语, 就主要不是处理这些话语本身故意“遮蔽”了什么, 而是要研究这些话语出现的具体的历史情景和语境, 研究究竟是何些话语被选择, 而另外的话语被搁置, 就是要研究不同话语之间的竞争关系。参见 Mesut Yeğen, “The Kurdish Question in Turkish State Discourse,”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4, No. 4, 1999, pp. 555-568。此外,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陈功同学的硕士学位论文则比较详细地讨论了土耳其独立运动期间穆斯塔法·凯末尔对库尔德问题的认知, 参见陈功: 《土耳其独立运动期间凯末尔对库尔德问题的认知: 1919-1923》, 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9 年。

¹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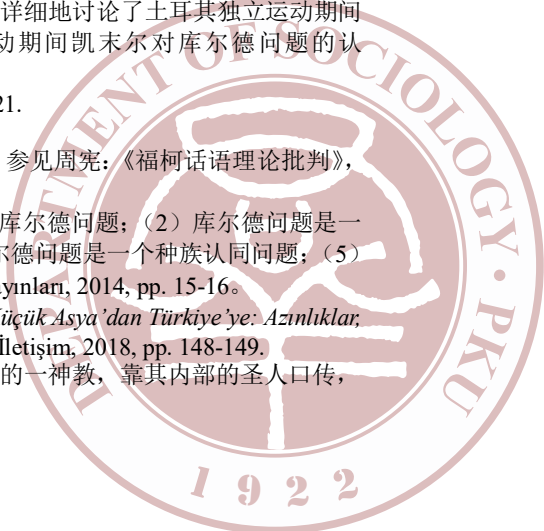
²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 54.

³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 41; 关于福柯的话语理论, 参见周宪: 《福柯话语理论批判》, 载《文艺理论研究》, 2013 年第 1 期, 第 121-122 页。

⁴ 土耳其学者阿尔坦·谭总结了关于库尔德问题的五种认知理路: (1) 不存在库尔德问题; (2) 库尔德问题是一个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问题; (3) 库尔德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 (4) 库尔德问题是一个种族认同问题; (5) 库尔德问题是一个国族问题。参见 Altan Tan, *Kürt Sorunu*, Istanbul: Timaş Yayınları, 2014, pp. 15-16。

⁵ 关于库尔德人的起源, 仍然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参见 Michel Bruneau, *Küçük Asya'dan Türkiye'ye: Azınlıklar, Etnik-Milli Homojenleştirme, Diasporalar*, translated by Ayhan Güneş, Istanbul: İletişim, 2018, pp. 148-149。

⁶ 耶济德派 (Yezidism) 如今大约有 100 万人, 它被认为是一种很古老且独特的一神教, 靠其内部的圣人口传,



尽管各种差异仍然存在，但库尔德人现在已经具有了一种共同的民族意识。

16 世纪初，在奥斯曼帝国苏丹塞里姆一世（Selim I, 1512-1520 年在位）向东部和南部扩张的扩张中，库尔德人正式被纳入帝国的统治。¹跟很多传统帝国类似，奥斯曼帝国对不同的宗教或教派、族群或边地人民也实行某种具有“因俗而治”特征的间接统治，其主要特征就是在当地人效忠苏丹和中央政府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尊重当地人传统的宗教、文化、习俗或法律，让当地的传统精英进行统治，奥斯曼中央政府基本上不干涉其日常事务。²在奥斯曼的地方总督干预当地人民事务的时候，奥斯曼苏丹甚至会警告那些地方总督们不要这样做，要遵守苏丹与当地人签订的“协议”（ahidname/sözleşme），正是通过这些“协议”，苏丹承诺并赋予了当地人民以自治权。³

库尔德人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就属于上述情况。⁴在塞里姆一世东征伊朗的过程中，有一些库尔德人曾帮助奥斯曼帝国，从而获得了某种半自治的地位（yarı özerklik）⁵。塞里姆一世通过书面协议的形式，承诺帝国治下的库尔德人的家园永享自治权，他们的部落领导人（aşiret beylikleri）的权威得到认可。之后，奥斯曼帝国苏丹苏雷曼大帝（Süleyman I, 1520-1566 年在位）对此予以认可。⁶在 19 世纪以前，库尔德人在多个不同部落领导人传统权威管理下的那种半自治地位基本上得到了保障的。

19 世纪以前的奥斯曼帝国时代，奥斯曼人看待库尔德人，主要是在肯定库尔德人同属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前提下，强调他们作为帝国重要军事力量的角色与作用。苏雷曼大帝曾说过：“就如同真主……曾允诺‘双角王’亚历山大建立阻挡歌革（Gog）的墙一样，神也使库尔德斯坦保卫我的王国，它就像阻挡波斯的恶魔歌革的煽动的铜墙铁壁……”⁷。苏丹穆拉特四世（Murat IV, 1623-1640 年在位）曾给所有的库尔德首领一份文件，其中写道：“你们，从祖辈到父辈，世代代是纯粹之民，是逊尼派的成员，在所有的对抗伊朗红头派（指什叶派—笔者注）的战斗中，你们数万名以勇猛善战著称的库尔德士兵，总是集结在我胜利之师的前面，你们的事业就是浴血奋战、取得胜利……”⁸。同一份文件中还强调了奥斯曼帝国一直致力于保障库尔德人的当地精英和人民的生活方式不受干扰，谴责了地方总督干预库尔德事务的行为，并保证纠正这些干预和压迫行为。

从这些当时的文献可以看出，在 19 世纪以前，奥斯曼帝国官方对库尔德人的独特身份以及生活方式，是有清晰认知的，并坚持对库尔德人的“因俗而治”。在奥斯曼中央政府和苏丹的眼中，库尔德人是帝国重要的军事力量，同属逊尼派，是在帝国东部边疆对抗什叶派伊朗之挑战的重要力量。

如果承认民族是一个与特定领土主张紧密相关的近现代现象⁹，那么，跟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情况相似，在多宗教、多种族的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时期，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也是不存在的。

该派在很多方面与中东地区的其他宗教存在共通之处，包括密特拉教、琐罗亚斯德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参见 Nadia Murad, *The Last Girl*, New York: Tim Buggan Books, 2017, pp. 5-6.

¹ Caroline Finkel, *Osman's Dream: The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5, p. 106.

² 关于这个问题，参见咎涛：“‘因俗而治’还是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多元主义？——以所谓‘米勒特制度’为重点。”载钟焯主编：《新史学》，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13 辑。

³ Latif Tas, “The Myth of the Ottoman ‘Millet’ System: Its Treatment of Kurds and a Discussion of Territorial and Non-Territorial Autonomy,”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inority and Group Rights*, Vol. 21, No. 4, 2014, pp. 499-502, 509.

⁴ 在伊朗的恺加王朝(Qajar Dynasty, 1779-1921 年)治下的那部分库尔德人，情况也基本类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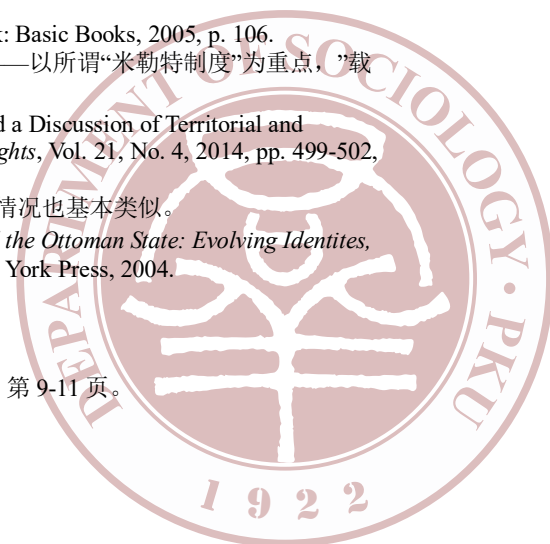
⁵ 关于库尔德人帮助奥斯曼帝国打仗，可参考 H. Özoğlu, *Kurdish Notables and the Ottoman State: Evolving Identities, Competing Loyalties, and Shifting Boundari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⁶ Latif Tas, “The Myth of the Ottoman ‘Millet’ System,” p. 508.

⁷ 转引自 Latif Tas, “The Myth of the Ottoman ‘Millet’ System,” p. 509.

⁸ 转引自 Latif Tas, “The Myth of the Ottoman ‘Millet’ System,” p. 510.

⁹ 【美】斯蒂芬·格罗斯比：《民族主义》，陈蕾蕾译，译林出版社，2017 年，第 9-11 页。



尽管颇有争议，一般地，奥斯曼帝国所谓的“米勒特制度”（millet system），可以被总结和概括如下：帝国政府根据几大不同宗教或教派，对帝国内不同人群进行分类管理的、具有较高自治性以及一定文化多元主义色彩的社会治理模式¹，这一模式具有明显的近东帝国制度传统²，也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征服大片非穆斯林领土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有效的社会管理模式³。由于帝国并不存在自上而下明确设计的所谓米勒特制度，因而，有的学者不主张用此概念来分析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史，但也有学者主张，可以使用“米勒特做法”（millet practice）来概括奥斯曼人的治理方式。“米勒特做法”指的不只是一种基于宗教差异赋予被统治者一定自治权的治理方式，而是根据宗教、教派和族群等多种差异，实行“因俗而治”。

就奥斯曼治下的库尔德人来说，虽然他们主要也是逊尼派穆斯林，但他们的语言、风俗、习惯和法律与土耳其人是不同的，与其他非穆斯林更不一样，他们之间也存在多种差异，部落认同或地方认同是首要的，他们享有某种半自治地位，也就是说，帝国并不强行让库尔德人“土耳其化”，也不会通过帝国法官（kadi）来干预库尔德人的习惯法。

另外，可以看得出，帝国很强调库尔德人同属伊斯兰教逊尼派的角色，那些属于红头派或什叶派的库尔德人，当然是被打击的对象。这也反映出，在传统社会，宗教认同是很重要的，宗教话语是包括库尔德人在内的帝国广大臣民之身份表达的重要形式。尽管帝国知道库尔德人作为生活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山区的穆斯林，有着不同的民族特性（包括语言），但帝国政府一方面承认并称呼他们是库尔德人，另一方面更强调库尔德人同属逊尼派穆斯林的身份。对他们的部落生活方式和习俗，帝国也是了解和尊重的，并确保其不受中央的干预和干扰，享受“因俗而治”。库尔德人直到近代，还是生活在部落社会中，在帝国长期的“因俗而治”的宽容政策下，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一样，并没有产生一种明确的、普遍的民族意识。在19世纪以前，多个库尔德人集团在帝国治下是维护帝国的力量，而不是分离势力。

学界通常认为，在奥斯曼帝国各族群中最早出现近代民族意识的是巴尔干基督徒，他们是在法国大革命后主要因为受外来影响拥抱了民族主义。土耳其历史学家伊尔拜·奥泰勒指出，这种认识并不是很正确，巴尔干人在历史上曾经建立过独立的国家，拥有独立的教会与文学语言，这些历史遗产是他们民族意识产生的重要因素；在巴尔干的斯拉夫人中，他们的民族意识的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的影响，16-17世纪时南部斯拉夫人知识分子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影响；即使在16世纪以来的某些巴尔干地区的农民暴动中，也可以发现某些民族意识的痕迹；在造成巴尔干地区民族主义发展的各因素中，还不能忽视1683年奥斯曼帝国第二次围攻维也纳的失败，这次失败使得奥斯曼帝国在国内外的权威受损，它鼓励了巴尔干地区民族主义的发展，同时，战败也使得奥地利与俄国在多瑙河流域的影响增强了。⁴

¹ 没有历史证据表明存在一种有意识地建立起来的“米勒特制度”（millet system），奥斯曼帝国创立“米勒特制度”这种说法，最初只是后世学者的一种总结，是简化、想象或误解的结果，经过学者的质疑和修正后，“米勒特制度”创立说多被作为“迷思”（myth）看待了。关于米勒特制度创立的“迷思”这个问题，是过去二三十年来奥斯曼帝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的论辩主题，传统上的那种认为帝国创立了该制度的说法，虽然大部分遭到了质疑，但仍不能否认的是，的确存在一种基于宗教差异的多元主义治理方式。因而，米勒特制度这个说法目前还没有被弃用。Benjamin Braude, “Foundation Myths of the Millet System,” in Benjamin Braude and Bernard Lewis, ed., *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Empire*, 2 vols, New York and London: Holmes & Meier, 1982, pp. 69–88; 咎涛：“‘因俗而治’还是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多元主义？——以所谓‘米勒特制度’为重点”。

² K. Barkey, *Empire of Difference: The Ottoma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哈吉安、刘志华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16页。

³ 在这个问题上，同时也还要考虑到，突厥人来到拜占庭领土上的时候，他们是作为少数人生活在人数更多的基督教徒之中的，而奥斯曼帝国的成长也是经历了一个从巴尔干大国到近东帝国的过程。尤其是14-16世纪，奥斯曼帝国是作为一个巴尔干国家诞生和发展的。İlber Ortaylı, *İmparatorluğun En Uzun Yüzyılı*, İstanbul: Kronik Kitap, 2018, p. 66.

⁴ İlber Ortaylı, *İmparatorluğun En Uzun Yüzyılı*, pp. 63-65.



即使是在上述背景下，在 19 世纪上半叶力主帝国改革的苏丹马赫穆德二世（1808-1839 年在位），仍然是以传统的宗教标准评判时事的。比如，他主要也是基于宗教的原因，不愿意聘请来自欧洲的基督徒教师，为了请到穆斯林教师，他宁愿向自己的对手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求助，但遗憾的是，阿里回复说：“在穆斯林当中，还没有懂得现代军事和科学的人”¹。从这种行为也可以看出，直到那时，帝国境内的穆斯林虽然对各自的族群差异有认知（主要是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的不同），但还主要是以宗教作为标准来区分不同群体的。不过，随着各基督教民族的分裂主义愈演愈烈，伊斯坦布尔的“高门”²不得不想方设法改变这种局面，以挽救帝国。

三、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库尔德问题”

19 世纪之后，为应对国内外民族主义威胁，奥斯曼帝国统治阶层发展出一种可以被视为国族主义的“奥斯曼主义”（Osmanlılık）。³ 简言之，就是开始赋予帝国境内的臣民们平等的公民权，所有人不论宗教或民族出身，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公民都是平等的。不能说这种主张没有吸引力，但从历史大势来看，民族主义已然兴起，而奥斯曼帝国由于自身经济和军事力量日益落后，越来越无力应对国内外的危机和威胁，因此，帝国改革派所提出的这种主张和政策也无法挽救帝国。需要强调的是，奥斯曼主义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它是一项错误的政策，更大程度上是势所使然。

在奥斯曼主义之外，帝国晚期还发展出了一种主要是针对穆斯林民众的泛伊斯兰主义。这种主张出现的背景在于，俄国和欧洲列强不断地以宗教为借口干涉奥斯曼帝国内政，尤其是随着奥斯曼帝国大部分基督教领土的丧失，相应地境内穆斯林人口比重迅速上升，加强穆斯林之间的团结也就日益重要了。⁴

19 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加强中央集权，这要求终结帝国中央与边缘那种传统的松散状态，过去“因俗而治”的政策就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奥斯曼帝国政府也意识到，以游牧一部落生活方式为主的库尔德地区，作为帝国的边缘向来就是不稳定因素。因而，如何掌控和利用这股力量，就成为帝国加强中央集权、改善地方治理时必须予以认真考虑的问题。⁵就库尔德地区来说，奥斯曼政府自坦齐麦特时期以来，越来越不愿意让库尔德人实行“自治”，但加强中央集权的结果导致习惯了自治的边疆地区出现了反抗和叛乱。1840-1847 年间，库尔德地区就出现了叛乱。⁶帝国政府进行了镇压，并继续加强中央集权，到 19 世纪 80 年代，库尔德人的半自治地位不复存在。

哈米德二世时期（Abdülhamid II, 1876-1909 年）出现了强调锻造帝国主体人口的论调。这种论调主张以土耳其人为核心，逐渐将其他穆斯林人口吸收进来，包括阿拉伯人、库尔德人、阿尔巴尼亚人等，这个主体人口将成为帝国可靠的元素，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锻造这个主体人口的两个途径就是教育和参军。⁷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同化政策。帝国政府之所以这么努力地想同化库尔德人，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就是，库尔德人长期被认为是“潜在的土耳其人”

¹ İlber Ortaylı, *İmparatorluğun En Uzun Yüzyılı*, pp. 46-47.

² Babiali, 英文一般译为“Sublime Porte”，指奥斯曼帝国的朝廷或中央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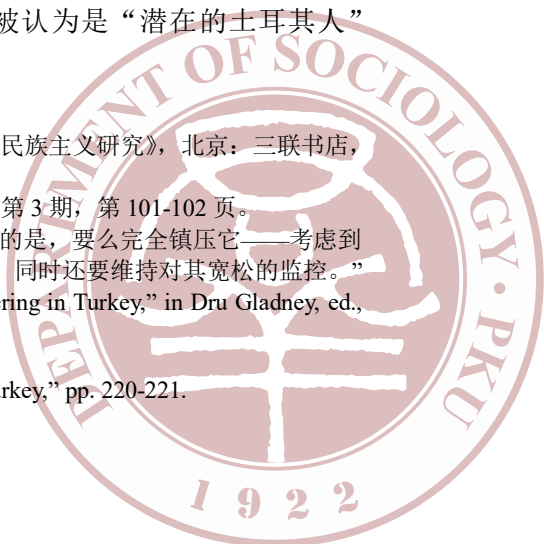
³ 关于奥斯曼主义，可参见咎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 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1 年，第 113-126 页。

⁴ 咎涛：《全球史视野下的土耳其革命与变革》，载《社会科学战线》，2019 年第 3 期，第 101-102 页。

⁵ 如杜贵（Duguid）所言，“库尔德人潜在地是这个地区的危险因素，需要做的是，要么完全镇压它——考虑到时代特征与征服，这个政策显然是未经深思熟虑的；要么就纵容和讨好它，同时还要维持对其宽松的监控。”转引自 Selim Deringil, “From Ottoman to Turk: Self-image and Social Engineering in Turkey,” in Dru Gladney, ed., *Making Majoritie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22.

⁶ Latif Tas, “The Myth of the Ottoman ‘Millet’ System,” p. 516.

⁷ Selim Deringil, “From Ottoman to Turk: Self-image and Social Engineering in Turkey,” pp. 220-221.



(müstakbel Türk)。¹

就教育来说，1892年创立的部落学院(Aşiret Mektebi)是非常重要的机构，其目的就是要同化库尔德、阿拉伯和阿尔巴尼亚的地方精英。这些地方精英的男孩们被送到首都进入部落学院，接受土耳其化和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包括学习土耳其语和伊斯兰神学。其中的优秀者会被派回去做地方大员。这种教育体制的出现，一方面表明中央政府对当地的民族特点是很了解的，另一方面也诉诸一种进步主义的话语，把当地人看成是野蛮的、不文明的，是需要接受文明化的再教育的对象，而这个文明化的目的当然是使这些精英首先接受土耳其化的文化与生活方式，成为维护帝国的中坚力量。²

一般认为，19世纪末创立的、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哈米德军团(Hamidiye Alayları)，是奥斯曼帝国政府利用和拉拢库尔德人对抗亚美尼亚人的产物。³当时，随着亚美尼亚民族主义情绪逐步高涨，东部地区日益不稳定，哈米德二世在库尔德人中组织这样一个非正规军军团，目的就是让他们来协助帝国稳定当地秩序。⁴在历次镇压亚美尼亚人的运动中，库尔德人的哈米德军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帝国政府的另一个考虑是，通过赋予库尔德人这样的权力以约束他们，并期待其更加效忠于中央政府。⁵此外，帝国依然坚持传统上排斥和打击什叶派的做法，库尔德人中也有部分什叶派，而哈米德军团的库尔德人是逊尼派的，他们也会被鼓动去打击什叶派的库尔德人⁶。这再次表明，在对待不同族群时，宗教差异对奥斯曼帝国至关重要。帝国的目标始终是将库尔德人吸收为可靠的、能够维系帝国的力量，也就是拉拢和利用库尔德人。

从哈米德军团这一事例也可以看出，奥斯曼帝国晚期针对库尔德人的政治话语主要还是宗教性的，即伊斯兰的，其政策框架是奥斯曼主义，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维系奥斯曼帝国。有学者认为，哈米德军团这一体制设计具有双重影响，首先是在帝国晚期强化了库尔德人的部落认同，从而延缓了其民族意识的发展；其次是部落学院的教育以及在战场上的经历，培养了一批具有开阔视野的库尔德人精英，为后来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做了干部上的准备。⁷

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推翻了哈米德二世之后，改哈米德军团为部落军团(Aşiret Alayları)，但也有青年土耳其党的重要人物考虑把军团的名字改为“乌古斯军团”，这反映出土耳其民族主义在这一时期的上升，毕竟，乌古斯主要还是与突厥人的族源传说有关⁸。有学者认为，19世纪中后期以来，奥斯曼帝国针对库尔德人的政策是土耳其化，奥斯曼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只是外衣，实行土耳其化才是实质⁹，笔者认为此论有失偏颇，原因在于，虽然长期来看土耳其化可能是一个趋势，但维系奥斯曼帝国、强调伊斯兰的团结，并不只是口号，而是帝国晚期政治精英的真实目标。或许可以说，19世纪末以后，土耳其化在发展，但在1904年阿克楚拉(Yusuf Akçura, 1876-1935年)发表其著名的《三种政策》¹⁰的时候，土耳其化还没有成为帝国的一个重要政策选项。

四、土耳其民族运动期间的“库尔德问题”

¹ 转引自 Latif Tas, “The Myth of the Ottoman ‘Millet’ System,” p. 517.

² Latif Tas, “The Myth of the Ottoman ‘Millet’ System,” p. 518.

³ 除了巴尔干地区，挑战帝国权威的内部非穆斯林分离主义的重要势力是亚美尼亚人，帝俄和其他欧洲列强对这个地区的影响也很大。Selim Deringil, “From Ottoman to Turk: Self-image and Social Engineering in Turkey,” pp. 222.

⁴ Caroline Finkel, *Osman's Dream: The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p. 502.

⁵ Caroline Finkel, *Osman's Dream: The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p. 5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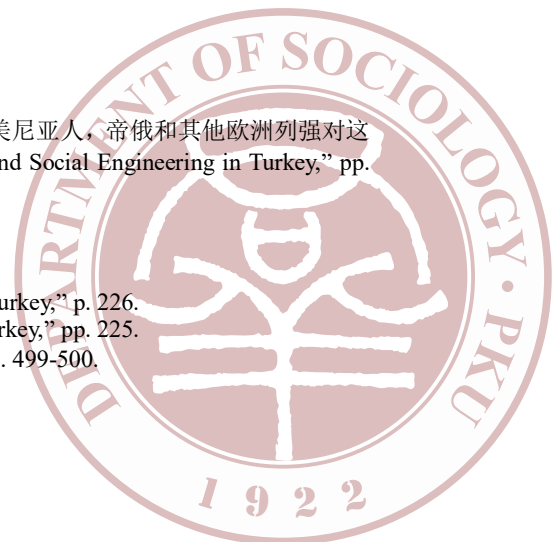
⁶ Latif Tas, “The Myth of the Ottoman ‘Millet’ System,” p. 517.

⁷ Selim Deringil, “From Ottoman to Turk: Self-image and Social Engineering in Turkey,” p. 226.

⁸ Selim Deringil, “From Ottoman to Turk: self-image and social engineering in Turkey,” pp. 225.

⁹ 关于此类观点，参见 Latif Tas, “The Myth of the Ottoman ‘Millet’ System,” pp. 499-500.

¹⁰ Yusuf Akçura, *Üç Tarz-ı Siyaset*, Ankara: Türk Tarih Kurumu Basımevi, 1976.



到 20 世纪初，人们对族群之间差异的认识是更加清楚了，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也在发展。被送到伊斯坦布尔接受教育和监视的库尔德精英们，在接触到民族主义思想之后，也发展出以对库尔德斯坦土地认同为基础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并成立了不同的库尔德人组织。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库尔德精英在伊斯坦布尔成立了“库尔德进步与互助社”（Kürt Teraki ve Teavun Cemiyeti），但随着大战的爆发，这些库尔德精英也上了战场，其组织趋向涣散。战争结束后的 1918 年 12 月 17 日，“库尔德进步与互助社”的部分成员参与创立了著名的“库尔德斯坦复兴社”（Kurdistan Teali Cemiyeti）。该组织在库尔德知识分子中引发了巨大反响，一些著名的库尔德家族人士、宗教人士以及教育界人士都参与其中。该组织的目标是“捍卫库尔德人的利益”与“支持民族事业”（ulusal davanın desteklenmesi）¹。除了库尔德斯坦复兴社，这一时期还有其他一些库尔德人的组织相继建立起来。

这一时期，虽然库尔德精英已经有了库尔德民族认同，但他们在政治主张上却是分散的，有的希望建立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有的则支持奥斯曼哈里发，在广大库尔德民众中，民族主义更不是主流。由于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主要活跃在伊斯坦布尔，离库尔德地区太远，即使他们在当地建立了分支机构，也没有多大政治影响力，更多地是从事社会-文化活动。有学者因此认为，库尔德斯坦复兴社很难被视为库尔德人的民族解放组织。²

凯末尔在领导土耳其民族独立运动之初，也注意到库尔德斯坦复兴社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存在，并认识到他们受到在伊斯坦布尔的库尔德人的遥控³。1919 年的土耳其民族独立运动初期，首先创立了“东部护权协会”（Vilâyet-i Şarkiye Müdafaa-i Hukuk-ı Milliye Cemiyeti）的埃尔祖鲁姆分部的民族主义人士，在东部各省份所执行的宣传及其行动目标中也提到，他们对土耳其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问题（Türklük, Kürtlük-Ermenilik meseleleri）从科学的、技术的和历史的角度的进行了研判，表示绝不妥协并（在科学、经济和宗教上）组织起来，坚决捍卫东部的每一寸领土。⁴

由上可知，在当时，土耳其民族主义人士对帝国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是有清楚认知的，但捍卫帝国统一是主流，库尔德人是团结和争取的对象。在土耳其民族主义阵营内部，争论主要是围绕“奥斯曼”“土耳其”“穆斯林”这几个身份而展开。19 世纪末期以来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日益上升，也明显地在安纳托利亚的革命阵营中表现出来，突出体现在“土耳其”这个身份的使用，毕竟安纳托利亚的主要人口说土耳其语。革命阵营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也故意采取了模糊策略，避免让这些争论削弱自身的团结和力量⁵，即尽可能地把不同表述并列放在一起，以满足团体身份的多样性。因此，其在使用“民族”（millet）一词时加上了多样化的定语，包括“奥斯曼”“土耳其”和“穆斯林”等等。最常见的则是把“土耳其”与“穆斯林”一起使用，以使大多数人都能满意。尽管他们对这些术语的具体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但在一个问题上他们可以达成共识，即安纳托利亚的斗争是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是穆斯林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欧洲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带有“圣战”的色彩，这正是当时的话语选择所欲达到的效果。在更具宗教色彩的话语之下，不管是土耳其还是库尔德的民族身份，都暂时退居了次要地位。

在 1920 年 5 月 1 日一次激烈的议会辩论中，来自锡瓦斯的代表埃米尔帕夏（Emir Paşa）力图说服其他人放弃“土耳其（人）”这个词，因为他觉得“土耳其（人）”不能体现安纳托利亚

¹ Felat Özsoy-Tahsin Eriş, *Öncesi ve Sonrasıyla 1925 Kürt Direnişi*, İstanbul: Peri Yayınları, 2007, pp. 28-29.

² Felat Özsoy-Tahsin Eriş, *Öncesi ve Sonrasıyla 1925 Kürt Direnişi*, pp. 29-30.

³ Kemal Atatürk, *Nutuk*, Cilt I, İstanbul: Milli Eğitim Basımevi, 1970, p. 6.

⁴ Kemal Atatürk, *Nutuk*, Cilt I, p. 5.

⁵ Howard Eissenstat, “Metaphors of Race and Discourse of Nation: Racial Theory and State Nationalism in the First Decades of the Turkish Republic,” in Paul Spickard, ed., *Race and Nation: Ethnic Systems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pp. 239-256.



正在进行的革命运动的广泛性。而有的代表则认为他是在玩文字游戏，有的则说“土耳其(人)”与“穆斯林”是相等的，没有必要放弃，但是，埃米尔帕夏似乎比较顽固，他说：“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建立了哈里发制度……我要求我们不仅以土耳其的名义行动，因为我们不仅仅是以土耳其人的名义聚集在这里。我请求你们，说穆斯林甚至是奥斯曼人要比说土耳其人更为合适。在我们的故乡有高加索人、车臣人、库尔德人、拉兹人和其他的穆斯林人民。让我们不要以一种分裂的方式来言说，那将使（这些群体）被排除在外。”¹

实际上，埃米尔帕夏所提出的这个关于民族身份与国家关系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当时只能以回避的、妥协的或者模棱两可的方式解决。针对埃米尔帕夏所引起的争论，凯末尔的回答采取了避重就轻的策略，一方面，他承认并非所有的土耳其人都被包括在他们所宣称的民族边界内；另一方面，他宣称革命运动是安纳托利亚的所有穆斯林的运动，包括了高加索人、库尔德人、拉兹和其他很多群体。凯末尔对这个问题采取了不争论的态度，也回避了埃米尔的关切：如果这场运动的目标是捍卫“穆斯林”的权利，那为什么还要坚持使用“土耳其人”这个词？²

凯末尔对民族身份问题采取的不争论态度，实际上是为了平息无谓的争论，暂时搁置这个问题，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现实斗争上来³。因此，民族身份问题一直就以模糊不清的状态存在着。1920年9月，在一场有关让非穆斯林志愿者参加国民军的辩论中，“土耳其人”被等同于穆斯林，与“非穆斯林”这个词语对立使用⁴。同年10月，在一场有关教育问题的争论中，有一个议员发问道：“难道土耳其的与穆斯林的不是同一回事吗？（Türk İslam değil mi?）”一位代表这样回答：“当一个人说自己是土耳其人的时候，他就是穆斯林……欧洲人也把伊斯兰世界称为土耳其啊。”⁵欧洲人的确长期把奥斯曼帝国称为土耳其，而土耳其这个词在欧洲人那里也经常是被等同于穆斯林/伊斯兰的领土。因而，在“土耳其等于伊斯兰世界”这样模糊的意义上，这一回答被多数人所接受。

但在民族主义迅速上升的历史背景下，国家构建中的民族身份问题所引发的争议迟早还是无法回避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土耳其民族主义最终占据了上风。1920年9月13日，凯末尔和部长委员会共同署名提交了一个包含三十一条内容的新宪法草案。该草案开始的“目标与原则”部分共包括四条，其中第一条中有“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用语，即原来“大国民议会”的名称前加入了“土耳其”（Türkiye）⁶一词。这似乎意味着，一个新的国家正在建立或者已经被建立了，它的名字就叫“土耳其”。在此过程中，反对者曾力图用“奥斯曼帝国”来取代“土耳其”，但他们没有成功。

但是，当时拟定宪法的秘密委员会（Encümen-i Mahsus）反对凯末尔等人的做法，没有把这四条内容放入其提出的宪法版本中，而是以“宣言”形式发布，理由是这四点内容与宪法并不直接相关。最终双方达成了妥协，“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这一术语在委员会宣言中得以保留，但在宪法文本中未出现“土耳其”一词；在1921年1月10日通过的新宪法第三条中，“土耳其国家”

¹ TBMM, *Zabıt Ceridesi*, Devre:1 Cilt 4, May 1, 1920, p. 165. 转引自 Howard Eissenstat, “Metaphors of Race and Discourse of Nation: Racial Theory and State Nationalism in the First Decades of the Turkish Republic,” p. 2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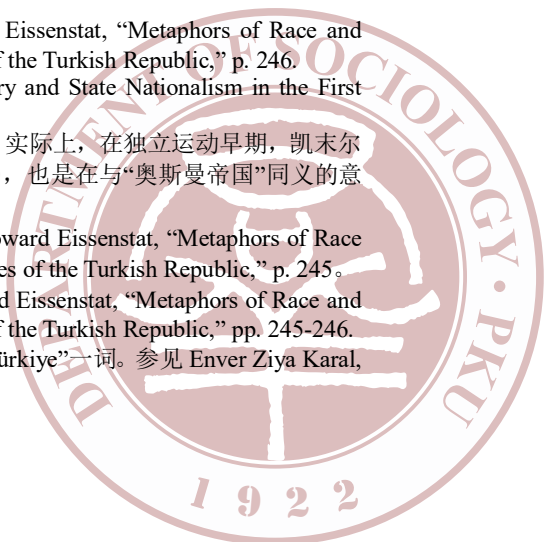
² Howard Eissenstat, “Metaphors of Race and Discourse of Nation: Racial Theory and State Nationalism in the First Decades of the Turkish Republic,” p. 247.

³ 笔者无意暗示凯末尔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建立土耳其民族国家的明确意识。实际上，在独立运动早期，凯末尔很少使用“土耳其人”（Türk）这个词，即使他偶尔说到“土耳其”（Türkiye），也是在与“奥斯曼帝国”同义的意义上使用的。

⁴ TBMM, *Zabıt Ceridesi*, Devre:1 Cilt: 4, September 26, 1920, p. 312. 转引自 Howard Eissenstat, “Metaphors of Race and Discourse of Nation: Racial Theory and State Nationalism in the First Decades of the Turkish Republic,” p. 245.

⁵ TBMM, *Zabıt Ceridesi*, Devre:1 Cilt: 4, October 4, 1920, p. 478. 转引自 Howard Eissenstat, “Metaphors of Race and Discourse of Nation: Racial Theory and State Nationalism in the First Decades of the Turkish Republic,” pp. 245-246.

⁶ 1920年1月，凯末尔在谈到威尔逊的计划时，提到土耳其国家，他就用了“Türkiye”一词。参见 Enver Ziya Karal, ed., *Atatürk ten Düşünceler*, Ankara: ODTÜ Yayıncılık, 2003, p. 3.



(Türkiye devleti) 也仅使用了一次。1921 年宪法宣布大国民议会的目标是“苏丹-哈里发的独立与解放，以及祖国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¹。“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一词首次出现在宪法中已经是土耳其建国后的 1924 年了。

考虑到“土耳其”一词具有与伊斯兰世界等同的模糊性，其种族-民族主义的特性也并不是那么强烈。但当其涉及到土耳其穆斯林与非土耳其穆斯林的分类时，它的种族-民族主义的特性就必然会凸显出来。在土耳其的语境下，国名虽然是土耳其 (Türkiye)，但族名被统一为土耳其 (Türk)，这就意味着，这就是非 Türk 的其他族群日益难以接受的了。这种内在矛盾不是今天才被人所知的，在历史上确定国名和族名之时，那些历史参与者对此就已有清醒的认识，只不过历史 (暂时) 没有沿着多元主义的道路前进。这是后来土耳其很多问题出现的根源之一，而当代土耳其正处在努力调整这一历史轨道的时期。

从民族认同的视角看，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主要面对的是土耳其民族主义²。换言之，土耳其民族主义是库尔德问题发生和演变的重要历史与现实政治框架。因此，要了解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首先必须对土耳其民族主义问题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³。基于种族特性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兴起于 19 世纪末，土耳其人是奥斯曼帝国境内获得民族意识比较晚的群体。如前所述，直到奥斯曼帝国事实上已经崩溃的独立战争时期，“土耳其” (Türkiye) 还只是在模糊的意义上被使用，土耳其民族主义在当时也未成为普遍的共识，它只是当时部分精英秉持的思想观念。

土耳其民族意识的出现，一方面涉及到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另一方面也涉及到“其他的”穆斯林，因为族裔意识是在对比的情境中建立的。如前所述，在独立战争期间，库尔德人的身份已被认识到，同时，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也有人反对使用“土耳其”这一概念和身份，而“土耳其”与“库尔德”等身份是并置的。正如当代土耳其学者所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恰那卡莱战役以及民族独立战争中，库尔德人是维护国家统一的，西方的煽动并没有影响到这一点。在民族独立运动时期，凯末尔等将领与库尔德人一起工作，强调“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共同奋斗”，在 1919 年的埃尔祖鲁姆会议 (Erzurum Kongresi) 的决议中，提到的是包括库尔德地区的东部省份不能从奥斯曼帝国分裂出去，强调与库尔德人是“亲兄弟” (öz kardeş) 关系⁴。第一次大国民议会与 1921 年宪法中提到，库尔德人是国家平等的伙伴、光荣的公民和主人，那时，一度是这样对待库尔德人的⁵。在当时，凯末尔等人使用的是土耳其 (Türkiye)，在指代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时，他们用的也是领土-人民意义上的土耳其人民 (“Türkiye halkı”)，而不是具有种族特性的土耳其人民 (“Türk halkı”)。这都说明当时土耳其的政治话语还是可以 (暂时) 平等地认识和对待库尔德人的，并承认库尔德人作为一个独特的族群是土耳其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一部分。

五、凯末尔主义的“库尔德问题”话语

然而，1924 年宪法与第二次大国民议会不再提库尔德人及其语言、文化和权利，不再把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并列，而是只提“土耳其人”和“土耳其民族”。1924 年宪法第 88 款表示，“土耳其人 (Türkiye ahalisi) 不论宗教与种族之差异，在公民身份上都被接受为土耳其人 (Türk tıtlak olunur)”⁶。当时有议员质疑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希腊人是否可以被称为土耳其人

¹ 有关 1921 年宪法的论述，参见 Atatürk Research Center, *November 10, 1994 State Ceremony Speeches and Atatürk and Turkish Identity Panel*, Translated by Serap Kızıllırmak, Ankara: 1999, pp. 34-36.

² 土耳其民族主义其实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国族意义上的，即国家认同与公民身份的问题；二是种族意义上的，即 Türk，其原本是作为一个种族-族群的名称，同时也被土耳其官方确定为国民身份，即土耳其人或土耳其国民。

³ 关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可参见咎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 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

⁴ Felat Özsoy-Tahsin Eriş, *Öncesi ve Sonrasıyla 1925 Kürt Direnişi*, p. 54.

⁵ Mahmut Akpınar, *Kürt Sorunu ve PKK Nereye Gidiyor?*, Ankara: Edge & Elhan Kitap Yayın Dağıtım, 2015, p. 24.

⁶ Altan Tan, *Kürt Sorunu*, p. 16.



（“Türk”），建议不用土耳其人（“Türk”），而是使用更具国族性质的土耳其国民（“Türkiyeli”），这个主张最终还是被否定了¹。最终被坚持的主张是，除了土耳其人（Türk）之外，国家不承认其他的民族（millet）。²这成为此后多年土耳其官方针对库尔德人的正式话语。

在1924年宪法之前，凯末尔时代的二号人物伊斯迈特·伊诺努（İsmet İnönü）就曾在1923年的洛桑会议上表达了其关于库尔德人的观点。他在洛桑会议上称库尔德人为图兰人（Turanian），强调库尔德人最初操土耳其语，由于库尔德人生活方式的封闭性，在历史上他们又不断遭到入侵和其他文化的影响，才逐渐发展出一种不同的“腔调”——库尔德语，因此，库尔德语的内核还是土耳其语。库尔德语不是独立于土耳其语的存在，库尔德文化也不是独立于土耳其文化的存在，也就没有独立于土耳其民族的库尔德民族。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来自相同的种族，历史上生存于同一片领土，为相同的目标而奋斗，他们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他们有相同的信仰、习惯和风俗，相似的生活方式将他们联系起来。³

可见，随着民族斗争形势的好转以及后来统一民族国家建设提上议事日程，之前较为平等地对待库尔德人的态度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具有种族特性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占据了上风，并延续到21世纪。这成为土耳其官方对库尔德问题的主流话语。

讨论当代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必须要回到《洛桑条约》。土耳其国家没有赋予库尔德人以“少数民族”身份，也有一定的法律依据。《洛桑条约》第三章关于“少数民族权利”的规定（Ekalliyetlerin himayesi/Aznlkların korunması）中⁴，所谓“少数民族”，在土耳其是指非穆斯林及宗教上的少数派⁵。土耳其正是据此长期不给予库尔德人少数民族的身份，因为库尔德人也是穆斯林，并不是宗教少数派⁶。不过，《洛桑条约》第39条也规定了不能在土耳其限制任何语言之自由使用，即便是有国语，但母语不是土耳其语的土耳其国民仍有权在法庭上口头使用自己的母语，这被视为对库尔德人有利的条款。只是土耳其国家长期限制库尔德语的使用。⁷

除了正面地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建设的角度强调土耳其的单一民族特性之外，库尔德人的行动也强化了这种趋势。由于将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捆绑在一起的最重要因素就是苏丹-哈里发，尤其是哈里发所代表的宗教统一。随着苏丹制和哈里发制的废除，库尔德人的梦想破碎了。共和国建立之后，关闭宗教学校、字母改革、强制土耳其语教育等猛烈的世俗化措施使库尔德人受到了巨大冲击，而库尔德人最反对的就是新国家废除和改变了宗教的机构与原则。换言之，这些现代化变革打破了库尔德人与新国家能够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纽带，相对封闭和传统的库尔德人难以接受新的国家秩序。

不断发生的库尔德人叛乱使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更加强化了单一民族国家的主张和政策，并在单一国族认同之外排斥其他的亚身份，除了土耳其认同之外，库尔德、拉兹、切尔克斯等认同都被认为是需要被废除的错误观念。而“土耳其史观”和“太阳语言学说”等官方支持的伪学说，也同时服务于否定或抹杀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土耳其近代著名的思想家齐亚·格卡尔普（Ziya Gökalp, 1876-1924年）曾经提出的理论在此时被利用和宣扬，即库尔德人其实是对自身没

¹ 这个主张直到今天仍在被热烈地争论着。

² Altan Tan, *Kürt Sorunu*, pp. 16-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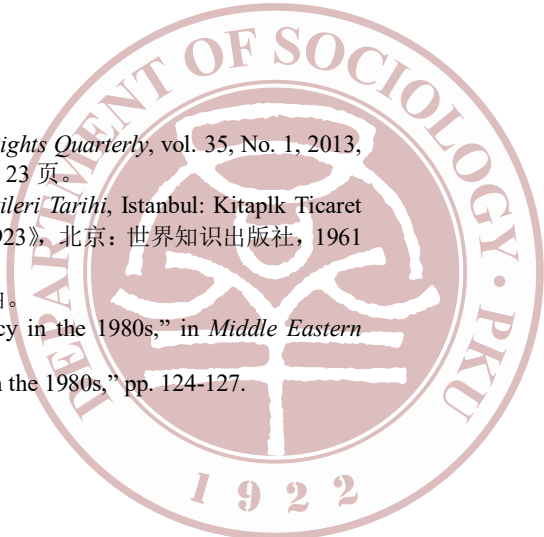
³ Derya Bayr, “Representation of the Kurds by the Turkish Judiciary,” in *Human Rights Quarterly*, vol. 35, No. 1, 2013, pp. 116-142. 转引自李秉忠：《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第23页。

⁴ 该具体条款的土耳其文本参见 Ali Kemal Meram, *Belgelerle Türk-İngiliz İlişkileri Tarihi*, İstanbul: Kitaplık Ticaret Limited irketi, 1969, pp. 256-258; 中文版参见王绳祖：《国际条约集, 1917-192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856-859页。

⁵ 根据对等原则，希腊也要确保自己境内的穆斯林少数群体的权利和宗教自由。

⁶ Muhittin Ataman, “Özal Leadership and Restructuring of Turkish Ethnic Policy in the 1980s,” i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8, No. 4, October 2002, p. 124.

⁷ Muhittin Ataman, “Özal Leadership and Restructuring of Turkish Ethnic Policy in the 1980s,” pp. 124-127.



有认识的土耳其人，他们是“山地土耳其人”，而且绝不接受库尔德语¹。关于土耳其官方坚持此种话语的原因，有学者解释为当时激进的西方化改革遇到了阻力和反抗²，而库尔德人的反抗是最令人头疼的，因此针对库尔德人的话语不是种族认同问题，而是进步与落后、传统与现代、文明与野蛮的对峙，其目的在于推倒阻碍现代化的反动落后势力，为国家的进步扫清障碍。事实上，1925年的谢赫赛义德起义（Shaikh Said Rebellion），在当时也的确是主要围绕宗教问题，而不是以库尔德主义为中心的。³

麦苏特·严教授在分析土耳其国家在这一时期关于库尔德问题的话语时指出，土耳其国家此时并没有将库尔德叛乱解释为“库尔德问题”，即没有指出这一问题的“种族”属性，以往的研究认为这是土耳其国家故意遮蔽了库尔德认同，但严教授认为并非如此，他通过细读土耳其官方的文本指出，当时土耳其国家并不是为了遮蔽库尔德认同而发展出一套话语，而是在国家大政方针的框架内重构了所谓的“库尔德问题”⁴。例如，对叛乱进行宣判的文本宣称，“你们多年来密谋组织叛乱，把这个地方投入了火坑。共和国政府的决定性行动与共和国军队的致命打击迅速摧毁了你们的政治反动和叛乱……所有人都必须知道，新生的共和国政府绝对不会宽恕任何被诅咒的煽动与政治反动，它将通过精确的预防来阻止这类匪患。这个地区的贫苦民众长期遭到谢赫与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必将从你们的煽动和恶行中得到解放，他们将沿着我们共和国的有效道路前进，它承诺了进步与繁荣。”⁵

到了多党制时代，尽管有关库尔德人的一些禁忌被取消了，但是，在使库尔德人成为库尔德人的权利方面，禁忌仍然继续。1960年的军人政变后，虽然军方主导颁布了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最具自由主义色彩的宪法，但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军方还是罢黜了很多库尔德领导人。政变后上台的军人总统杰马尔·古尔塞勒（Cemal Gürsel）曾为一本力证库尔德人其实是突厥人的书撰写的序言中强调，“世界上能够被称为‘库尔德人’的具有独立身份的种族是不存在的。”⁶军政府还通过新的法律，把很多村庄的库尔德名字改为土耳其语名字。随着自由主义宪法的实施，库尔德领导人针对军方的高压政策迅速出现反弹，尤其是一些新出现的组织具有更突出的库尔德种族特性。值得一提的是，土耳其工人党在1963年宣布承认安纳托利亚东部有库尔德人，这是土耳其现代史上第一次有政党公开承认作为一个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库尔德人的存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左翼组织更加热衷于讨论库尔德人的种族属性，但它们更为关心的还是阶级问题。土耳其官方很快转向了对左翼运动的镇压，但左翼运动对库尔德问题的关注极大地影响了很多库尔德人的族属认知。⁷

1980年，土耳其共和国发生了“二战”后的第三次军人政变，军方痛恨之前政治和社会领域发生的动荡与分裂，转而强调基于凯末尔主义和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国家统一，这相应地打击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表达和主张。军方的立场清晰地表现在其主导制定的1982年宪法中，政府针对库尔德人的一些举措，包括禁止使用库尔德语，都是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口号下进行的。为了打击库尔德认同，军方还复兴了20世纪三十年代的那些伪学说⁸。1980年军人政变的领导人柯南·埃夫伦（Ahmet Kenan Evren, 1917-2015年）将军及其亲信们的观点与古尔塞勒的观点并无二致，他强调库尔德人就是“山地土耳其人”的旧有说法，说因为他们生活在雪山上，走路的时候会

¹ Michel Bruneau, *Küçük Asya'dan Türkiye'ye: Azınlıklar, Etnik-Millî Homojenleştirme, Diasporalar*, p. 211.

² Kemal Kilişci, "Minority/Majority Discourse: The Case of the Kurds in Turkey," in Dru Gladney, ed., *Making Majoriti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38-239.

³ Mahmut Akpınar, *Kürt Sorunu ve PKK Nereye Gidiyor?*, pp. 24-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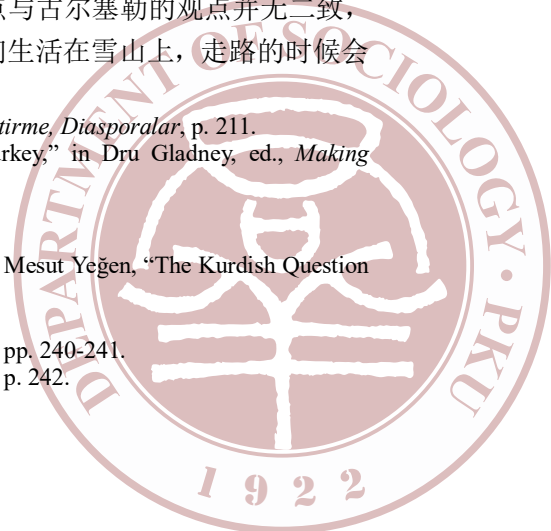
⁴ Mesut Yeğen, "The Kurdish Question in Turkish State Discourse," p. 560.

⁵ E. Aybars, *İstiklal Mahkemeleri (1920-1927)*, Izmir, 1988, pp. 325-326, 转引自 Mesut Yeğen, "The Kurdish Question in Turkish State Discourse," p. 560.

⁶ Altan Tan, *Kürt Sorunu*, p. 17.

⁷ Kemal Kilişci, "Minority/Majority Discourse: The Case of the Kurds in Turkey," pp. 240-241.

⁸ Kemal Kilişci, "Minority/Majority Discourse: The Case of the Kurds in Turkey," p. 242.



发出“kart, kurt”的声音，他们因此才被称为“库尔德”人（“Kürt”），并称库尔德人主要是从中亚来的。¹

尽管土耳其共和国坚持某种保守和专制的话语与立场，但这并不能一直抹杀库尔德问题的存在，也无法阻止人们讨论这一问题。除了前述左翼的重要角色之外，伊斯兰主义政党以及一些重要的土耳其政治家如厄扎尔（Turgul Özal, 1927-1993年）、德米列尔（Süleyman Demirel, 1924-2015年）等人，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0年军人政变后，掌握土耳其政治大权的军方除了高调宣扬凯末尔主义的民族政策外，还日益重视伊斯兰的意识形态作用，其目的当然是借其打击土耳其的左翼运动。但这便利了政治伊斯兰在土耳其的崛起。政治伊斯兰首先自视为凯末尔主义的受害者，在民族问题上并不固守僵化的凯末尔主义，具有某种自由色彩，强调的是在共同宗教信仰意义上的团结。1990年代初，也就是厄扎尔和德米列尔时代，土耳其有关库尔德问题的话语开始出现松动，其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原因是海湾战争的爆发，使得中东地区的库尔德问题国际化了，土耳其领导人不得不重视此问题²。厄扎尔强调多元性，承认土耳其存在多种族群³。1989年6月，厄扎尔称自己很有一半库尔德血统，这最终为土耳其将来正式承认库尔德问题的存在开辟了道路。1991年4月，对库尔德语的禁令被取消。⁴在厄扎尔时代，他重启了一个新的国民身份主张，即主张不再将国民称为土耳其人（Türk），而是土耳其国民（Türkiyeli），即在国名的基础上，把土耳其的公民和国民身份定义为“来自土耳其的人”，这才是真正公民或国民意义上的土耳其人。甚至有人建议干脆把土耳其国名改为“安纳托利亚”（Anatolia）⁵。当然，这种主张或界定此时仍处于论辩之中，且受到了来自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极大挑战，被指责为分裂土耳其国家。

关于1990年代以前土耳其官方的库尔德问题话语，最权威的总结，或许应该是已故土耳其领导人、前总统苏雷曼·德米列尔（1991-1993任总理，1993-2000年任总统）⁶。他是在2005年就埃尔多安党人提出解决库尔德人问题的“新思维”时回顾和总结这个问题的，所谓“新思维”问题，后文我们将详细讨论。德米列尔指出，是在他主政的时代，改变了土耳其共和国长期坚持的有关库尔德问题的话语，而他的主要贡献是“我们承认库尔德人的存在”⁷；对此，他是这样说的：“1990年之前，正如我所言，我们是不承认8种族的差异的。每个人在种族上也都是突厥/土耳其人。这就是1990年前土耳其的官方说法。是我改变了这个说法。我当总统的时候，我说我们承认库尔德人的存在。也就是说，在土耳其民族中还存在着其他种族的人，承认并接受这一点是必要的，我就是这么说的。话语的重要性即来自于此。但我没有将此看作是一个民族问题。我只是说，土耳其民族内部是存在着不同种族的。”⁹

德米列尔的这个总结是非常重要的，以过来人和亲历者的身份，他高度凝练地概括了土耳其共和国官方关于库尔德问题的话语及其变化。这就是：在1990年前，土耳其共和国并不承认库尔德人的存在，而德米列尔改变了这个。当然，德米列尔没有提及民族独立运动期间的情况以及厄扎尔的贡献。正如我们已经分析过的那样，在民族独立运动期间，凯末尔党人最初是承认库尔德人存在并积极争取库尔德人的。德米列尔解释说：“我说‘库尔德人之存在’时，指的是有库

¹ Altan Tan, *Kürt Sorunu*, p. 18.

² Muhittin Ataman, “Özal Leadership and Restructuring of Turkish Ethnic Policy in the 1980s,” pp. 129-131.

³ Muhittin Ataman, “Özal Leadership and Restructuring of Turkish Ethnic Policy in the 1980s,” pp. 128-129.

⁴ Kemal Kilişçi, “Minority/Majority Discourse: The Case of the Kurds in Turkey,” p. 243.

⁵ Muhittin Ataman, “Özal Leadership and Restructuring of Turkish Ethnic Policy in the 1980s,” p. 129.

⁶ 关于德米列尔，参见咎涛等著：《重新发现土耳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3-88页。

⁷ “Kürt realitesini tanıyoruz,” *Milliyet*, 17 Ağustos, 2005, p. 16.

⁸ 原文是“...rk farklılığı da tanıyorduk”（我们承认种族的差异），但根据前后文的逻辑，以及本段的小标题“90 öncesinde tanıyorduk”（90年之前我们不承认），此处显然属于排版的错误，即“tanıyorduk（我们承认）”应为“tanımyorduk（我们不曾承认）”。

⁹ “Kürt realitesini tanıyoruz,” *Milliyet*, 17 Ağustos, 2005, p. 16.



尔德人，我是说我们接受这一现实。这说明了什么呢？也就是说存在库尔德人，但他们是土耳其国民（Türk vatandaşı¹）。无论如何，作为土耳其人，并没有必要都来自土耳其种族（Türk ırkı）。当然也有属于土耳其种族的土耳其人，但土耳其这个词有超越于种族涵义之上的意思。这是一个民族的名字（milletin adı）。而这个民族的定义并不依靠于种族。土耳其民族，其概念含义即在于此。”¹

库尔德地区一直也是土耳其国家无法忽视的欠发达地区，从国家经济发展和繁荣的角度说，是需要重点投资和关注的。因而，从发展或经济的角度来重构库尔德问题，也成为另一种重要的话语形式，它关注的是国家在东部和东南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教育的投入。这一点由于不直接涉及民族认同问题，本文不予赘述。

六、正发党的库尔德“新思维”

历史地看，在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上做出最重要改变的应该就是2002年上台执政至今的正义与发展党（AKP，简称“正发党”）。²而正发党关于库尔德问题的政治话语并不是一致和连续的。作为一个伊斯兰主义政党，正发党偏好于以强调伊斯兰/穆斯林话语争取库尔德人的选票，实践证明其这么做也往往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正发党的话语特征是，除了强调伊斯兰宗教因素作为民族团结的共同纽带外，还强调自身作为凯末尔主义国家的受害者/反抗者的身份，“我们也是凯末尔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关的军队的受害者，我们的受害程度并不亚于库尔德兄弟。一旦我们掌权，我们的优先选择就是对国家重新定义，解构凯末尔主义意识形态。”³这种话语从根本上来说是出于拉选票的需要，而真正掌握了政权之后，正发党需要做的更多。在话语结构方面，2005年埃尔多安的重要演讲代表了正发党彼时的库尔德新政策。

历史的发展虽然是因果相承的，但必须承认的是，在历史发展的链条上总会出现被称为“转折点”的环节⁴。2004年，土耳其总理办公室下属的一个工作委员会——“少数民族群与文化权利工作组”——发布了一份报告，其主要主张是建议使用土耳其国民（Türkiyeli）这个身份符号，使其成为国族认同，而土耳其人（Türk）则降低为一个族群身份。该报告自然还是招致了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反对，但得到了大量媒体、知识分子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⁵

在此基础上，2005年8月土耳其时任总理埃尔多安在土东南部重要城市迪亚巴克尔发表了其“民主宣言”，这可以称得上是土耳其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新思维”，甚至有土耳其评论家直接就称之为“转折点”⁶。在正发党2012年提出的《2023政治愿景》中，它将自身对库尔德问题的解决方案定性为“范式转移”。在迪亚巴克尔演讲之后，土耳其国内舆论界对埃尔多安的“新思维”展开了极其热烈的讨论，赞扬欢迎者有之，批评抗拒者有之，充满期待者亦有之。更值得关注的是，埃尔多安演讲一周之后的8月19日，库尔德工人党（PKK）宣称“单方面停火”一个月，以等待政府的新政策。此后土耳其舆论界的反响更为强烈，一时间各种评论和争辩风起云涌。

只有了解埃尔多安的“新思维”以及土耳其国内对此产生的不同意见，才能理解当前土耳其

¹ “Kürt realitesini tanıyoruz,” *Milliyet*, 17 Ağustos, 2005, p. 16.

² 关于其具体立法和政策，可以参见 Ioannis N. Grigoriadis, “Türk or Türkiyeli? The Reform of Turkey’s Minority Legislation and the Rediscovery of Ottomanism,” i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3, No. 3, 2007, pp. 423-438.

³ 转引自李秉忠：《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第24-25页。

⁴ 在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上，1999年，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奥贾兰被捕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⁵ Ioannis N. Grigoriadis, “Türk or Türkiyeli? The Reform of Turkey’s Minority Legislation and the Rediscovery of Ottomanism,” p. 425.

⁶ 一位土耳其评论家写道：“如同所有其他被视为转折点的著名演讲一样，这篇演讲将翻开崭新的一页。”*Turkish Daily News*, August 13, 2005.



人在解决国内少数民族问题及反恐问题上的话语和主张，以及它们之间的主要分歧，感知当代土耳其政治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侧面。

（一）“更多的民主”：埃尔多安“新思维”的提出

2005年8月12日，埃尔多安访问了土东南部重要城市迪亚巴克尔，这里是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核心聚居地，也是齐亚·格卡尔普的出生地。埃尔多安在这里发表了被土耳其媒体称为“民主宣言”的著名演讲。在土耳其人看来，该演讲的发表意味着土政府对解决库尔德问题以及库尔德工人党的恐怖主义问题提出了新的思维。埃尔多安的演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次的内容。

第一，强调库尔德问题是个全国性的重大问题。埃尔多安说，“（库尔德问题）不仅涉及到我们人口中的一小部分，而是整个民族的问题。”“这个国家的所有问题都与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息息相关，无论他们是突厥人、库尔德人、拉兹人、阿布哈西亚人，还是切尔克斯人。这才是一个民族的真正含义。”

第二，强调必须通过建设性的思维来解决库尔德问题。埃尔多安主张，要在共和国原则与宪法允许的范围内，通过更高的民主、更多的权利和更大的繁荣来解决这一问题。土耳其的民主化进程将继续深入下去，直到每个公民都感觉到自由，“我们将永远不会让民主衰退。”

第三，强调必须坚决反对恐怖主义。埃尔多安在演讲中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旗和我们的共和国是神圣的，我们以此为荣。暴力和恐怖主义是这个国家的最大敌人，而且我们将永远不会宽恕它们。这就是我为什么告诉母亲和父亲们，我们这个国家将使你们的孩子免受恐怖主义之苦。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才是你们要找的、解决你们问题的人。”

第四，强调反对三种民族主义。埃尔多安在演讲中提到，他的正发党执政时曾宣布有三道“红线”是不能跨越的：“一是种族民族主义。在土耳其有很多的族群，我们不能对他们进行区别对待。我们都统一在土耳其共和国公民这一纽带之下。”二是“地方民族主义”，三是“宗教民族主义”。埃尔多安强调指出，无论一个人信仰什么，也无论他来自哪里，“我们都将对他们一视同仁。”¹

虽然埃尔多安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还讲了很多其他的细节，但重点就是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在埃尔多安访问迪亚巴克尔的两天前，他在伊斯坦布尔会见了15名知识分子的代表。虽然这次会见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并产生了一些争议，比如，出现了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批评，说这些人不是这方面问题的专家，根本不配参与意见，在事后的评论中，更激烈者认为，这些知识分子虽然声称追求和平，但根本就不懂政治。不管如何，土耳其媒体说，这是在土耳其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国家高级领导人首次公开而诚恳地征求知识分子的意见。

（二）关于新思维的争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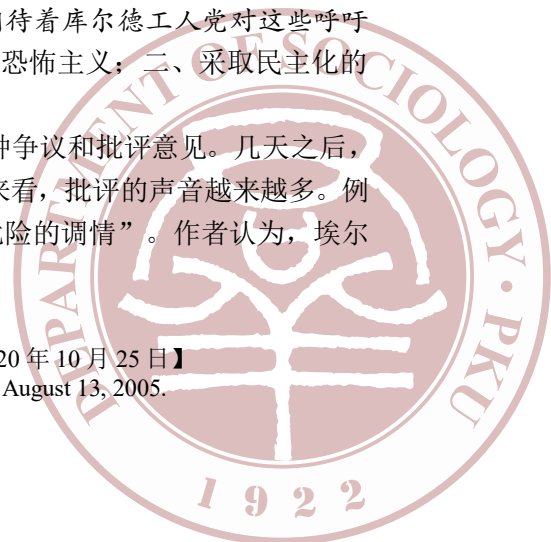
21世纪以来，土耳其人普遍希望尽快解决库尔德问题，特别是库尔德工人党的恐怖主义问题。因此，埃尔多安访问迪亚巴克尔之前，土耳其国内对埃尔多安充满了期待。埃尔多安发表演讲后的第二天，有评论员赞扬“埃尔多安表现卓越”，认为埃尔多安的立场“是大多数国人必将支持的。”“所有有良知的库尔德人都将会赞扬他。……我们将期待着库尔德工人党对这些呼吁的反应。”²该评论员还认为必须坚定地做两件事：一、坚决打击恐怖主义；二、采取民主化的新举措。

虽然埃尔多安的演讲具有突破性且十分老练，但依然出现各种争议和批评意见。几天之后，土耳其国内开始从他热情洋溢的表达中冷静下来，从媒体的报道来看，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多。例如，《国民报》(Milliyet)的一篇评论指出，埃尔多安的演讲是“危险的调情”。作者认为，埃

¹ 相关的演讲内容可以参见“Kürt sorunu benim sorunum,”

<https://www.hurriyet.com.tr/gundem/kurt-sorunu-benim-sorum-341847> 【2020年10月25日】

² Mehmet Ali Birand, “A Brilliant Performance by Erdoğan,” *Turkish Daily News*, August 13, 2005.



多安并不明白问题所在，而“对手（指库尔德政治组织）却十分明白，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期待，即大赦、语言教育、降低选举条件、清除政治限制、向库尔德工人党等组织开放政治参与道路……”。¹《自由报》（*Hürriyet*）的涂番·图兰赤（Tufan Türeñç）也列举了库尔德政治组织的要求，并质问埃尔多安在演讲前是否经过深思熟虑。他说：“难道埃尔多安身边的人不知道他针对库尔德问题的演讲将被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吗？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些话正在提升该地区人民的期望吗？”他还对埃尔多安有关将库尔德工人党与爱尔兰共和军作类比表示批评，“爱尔兰共和军停止恐怖主义活动，乃是英国多年来坚持抵抗他们的结果。土耳其的领导人应该明白，在涉及国家重大问题时，他们必须三思而后行。”²其实埃尔多安为自己留下了很大的回旋余地，并不是如有关评论家所说，库尔德工人党可以无限地提出要求，如果埃尔多安做不到的话，就等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反对党坚持其一贯的批评思路。土耳其最大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CHP）领导人拜卡尔（Deniz Baykal）批评埃尔多安的“新思维”，称政府当前的反恐政策是错误的，民主的方式决非答案。他说：“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在土耳其是一个政治工程。更多的民主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而且这个问题与民主也没有什么关系。”他认为政府的做法是为与库尔德工人党谈判开了绿灯。“但是，土耳其永远不会接受分裂主义，”PKK所追求的就是以种族为基础的政治结构。拜卡尔顺便也批评了那些知识分子们，他说，知识分子们在结束恐怖主义这个问题上的意图或许是好的，但是，他们应该知道最重要的是反对种族分裂主义。拜卡尔说，他永远不会去见埃尔多安会见过的那些所谓追求和平的知识分子们。³

关于库尔德人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土耳其的问题，土耳其专栏作家费克莱特·比拉（Fikret Bila）的一篇题为《从库尔德人的角度看土耳其》的文章分析得很透彻。比拉指出，现在库尔德人的重要政治组织实际上都与奥贾兰有密切关系，那么，他们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土耳其呢？“……土耳其共和国要么给予库尔德人想要的独立公民权以及（宪法）立法权，要么不给。这意味着，他们合法的身份认同被接受下来。共和国的文化存在与政治主权有赖于库尔德人的认可。这种认可必须依赖于相互间合法的保证。”⁴

2005年8月20日，库尔德工人党宣布“单方面停火”一个月，以作为对埃尔多安“新思维”的回应。PKK的一个领导人对媒体放言说：“我们将在这一个月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我们将给埃尔多安总理善意的努力以时间。”⁵土耳其政府拒绝对此事做任何评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土耳其外交部高级官员说：“他们是恐怖分子，我们不可能对他们的举动作出积极或消极的评价。”⁶

PKK的宣言在土耳其不像IRA在英国的反响那么大。人们普遍一致地反对与恐怖分子谈判。有评论认为，PKK这是在要挟政府。《土耳其每日新闻》上的评论更为激烈，认为土耳其是一个民族国家，坚决反对一切分裂势力。要坚决地同种族民族主义作斗争。据媒体报道，2005年7月28日，爱尔兰共和军发表历史性的声明，宣布正式结束“武装活动”，恢复解除武装，但称不会解散。这一决定为北爱和平进程的重新恢复带来了新的希望。⁷英国首相布莱尔称赞这是北爱历史上“无比重大的一步”，更为直率地强调“和平可以替代战争，政治可以替代恐怖”。而曾坐过大牢的前恐怖首领、现新芬党领袖亚当斯声明说，放弃武装斗争“是勇敢和坚定的步骤，代表着在爱尔兰寻求持久和平和公正进程中的一个决定性时刻”。他向政治对手呼吁“让我们来

¹ Melih Aşık, “Tehlikeli Flört,” in *Milliyet*, 19 Ağustos, 2005, p. 14.

² 转引自“Press Scanner: From the Columns,” in *Turkish Daily News*, August 20, 2005.

³ *Turkish Daily News*, August 20, 2005.

⁴ Fikret Bila, “Kürtler açısından nasıl bir Türkiye?,” in *Milliyet*, 19 Ağustos, 2005.

⁵ *Turkish Daily News*, August 20, 2005.

⁶ *Turkish Daily News*, August 20, 2005.

⁷ 见《新京报》，北京，2005年7月29日。



对话，让我们来投身，我们不要把这次机会浪费了”。“爱尔兰共和军长期采取的暴力手段不为欧洲社会所接受。在欧洲各国政府声讨伦敦恐怖暴行的声浪中，爱尔兰共和军及其政治组织放弃武装、不再使用暴力，无疑可以被视为欧洲反恐的一个重大政治成果。”¹

恐怖主义是 21 世纪人类所面临的重要的政治问题。在恐怖主义问题中，内部恐怖主义是一个重要内容。这里所谓的内部恐怖主义，指的是发生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恐怖主义，以区别于国际恐怖主义，“9·11”是典型的国际恐怖主义。而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搞的恐怖主义是比较典型的国内恐怖主义。

库尔德工人党在土耳其搞的恐怖主义活动是土耳其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自 1999 年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奥贾兰被捕以后，库尔德问题在土耳其出现了一个大的转折，军方与库尔德武装之间实现了停火。但自 2004 年以来，库尔德工人党又单方面宣布放弃停火。

2005 年前后，土耳其国内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以军方为代表的“强硬派”，他们认为对付恐怖主义的唯一方法就是以坚定的决心进行武力打击，直至消灭恐怖分子。除军方之外，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坚持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决不能与恐怖主义妥协，更不能与之谈判。²二是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为代表“民主派”，他们认为恐怖主义不只是个军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库尔德工人党的恐怖主义问题，在土耳其首先就是要解决“库尔德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指导原则就是“更深入的民主化”。³

有土耳其评论家表示，“尽管 1993 年土耳其总理曾公开承认了‘库尔德现实’（‘Kurdish reality’），但此次是另一位总理第一次力图说出全部的事实，即土耳其存在‘库尔德问题’。这是一个大的发展，必定很快转化为实际行动。”关于埃尔多安所说的“国家的错误”，该评论家表示，“这是总理所做的偷偷摸摸的道歉吗？或者是，它传递了一个信号，即政府将坚定地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来结束我国东南地区人民的被剥夺感？不管是什么，这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埃尔多安所说的“国家的错误”，实际上是指以前官方不承认库尔德问题的存在是错误的，从逻辑上来说就是否定了凯末尔主义的政策。

埃尔多安关于当代库尔德问题的提法，遭到土耳其前总统苏雷曼·德米列尔的批评，德米列尔说自己以往的话语是：“我们承认库尔德人的存在”；⁴而埃尔多安的提法是“存在库尔德问题”⁵。这两个政治家对此问题有不同的解释。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与 15 个知名知识分子座谈时说：“今天我在你们 15 位面前所讲的，已故的厄扎尔也说过，尊敬的德米列尔先生也讲过……”⁶这意味着他所谈的问题与以往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如前所述，德米列尔并不这么看。德氏认为，他的说法与埃尔多安的提法之间存在重要的区别，德米列尔没有将库尔德人视为问题：“土耳其民族中有来自其他种族的人。也就是说，成为土耳其人，并没有一个种族的条件存在。您可以说自己在种族上是库尔德人，但是您属于（土耳其）这个民族，您是这个国家的国民。如果您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国民，您就属于土耳其民族，在这个意义上，您是土耳其人。事实上，土耳其共和国宪法也是这么说的。它这样描述了土耳其性（Türklük）。在宪法第 66 款中说，凡是土耳其共和国国民皆为土耳其人。⁷这表明，还有一个建立在土耳其特性之上的认同。在种族上，您可以说自己是土耳其人、库尔德人或者其他种族的人，但是，之上的身份乃是土耳其人，即属

¹ 赵俊杰：“新芬党欲与恐怖主义划清界限”，《新京报》，2005 年 7 月 31 日。

² 当时即将卸任的土耳其将军陶龙则认为，必须区分恐怖主义与恐怖分子，军方应该负责坚决彻底地消灭恐怖分子，而政府应该更多地致力于解决恐怖主义问题。*Turkish Daily News*, August 13, 2005.

³ “Kürt sorunu benim sorunum,” <https://www.hurriyet.com.tr/gundem/kurt-sorunu-benim-sorumum-341847> 【2020 年 10 月 25 日】

⁴ “Kürt realitesini tanıyoruz,” in *Milliyet*, 17 Ağustos, 2005, p. 16.

⁵ “Kürt realitesini tanıyoruz,” in *Milliyet*, 17 Ağustos, 2005, p. 16.

⁶ “Kürt realitesini tanıyoruz,” in *Milliyet*, 17 Ağustos, 2005, p. 16.

⁷ “Türk Devleti’ne vatandaşlık bağı ile bağlı herkes Türk’tür.”



于土耳其民族。区别就在于此。但是，当以‘库尔德问题’代替了‘库尔德人之存在’时，您就是在说另一个问题了。您把民族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接受了。从这个角度看，我所说的与埃尔多安讲的不是一回事。”¹

在迪亚巴克尔的讲话中，埃尔多安说：“迪亚巴克尔跟安卡拉、埃尔祖鲁姆、孔亚以及伊斯坦布尔一样重要。你们都应该知道这一点。每一个国家都会犯错误。土耳其作为一个大国，在不断克服大量困难的过程中向前发展。忽视以前所犯的错误决非一个大国应该做的事情。一个大国和一个强大的民族是应该能够面对它的过错并以更强大的姿态面向未来的。这是我们的政府所坚信的。”

“我曾经以为引用了一首诗而入狱，我那时就相信我向我的人民传达了一个信息。在那个信息中我说：‘我没有对自己的国家感到不安或者愤怒。这个国家和这面旗帜是我们的。纠正这些错误的日子一定会到来。’”“有些人问我，‘库尔德问题将何去何从？’我的回答是：‘这个问题是我的问题，因为我是这个国家的总理。’”²埃尔多安还表示，忽视一个问题将意味着不尊重整个民族，每一个公民都理应从政府那里获得最好的东西。他提到和知识分子们的聚会。“聚会受到良好的称赞；然后，我们看到，有些政治人物甚至不能容忍聚会。那些不尊重思想的人，不配谈言论自由。那些不能容忍自由的人，也不配谈论自由。这样的人和群体注定会消亡。”他说，国家在东南部的政策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教育。在演讲的最后，埃尔多安说：“我将以一位诗人的诗句³来结束我的演讲，这位诗人曾呼吸过迪亚巴克尔的空气。”⁴

（三）“新思维”之后

埃尔多安上台时曾经对库尔德选民许下宏伟的经济发展愿景，但是这些目标大多没有兑现，与中东部土耳其人聚居的被称为“安纳托利亚之虎”的新兴城市相比，库尔德地区的发展乏善可陈。实际上，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政府多年来是希望解决库尔德问题，甚至曾准备与库尔德工人党实现全面和解。可以说埃尔多安的“新思维”开启了与库尔德人的十年和解进程。但这个所谓的“和解进程”遭到了多方压力，最终因为双方都失去了耐心而走向失败。

在2005年之后，土耳其在埃尔多安的领导下还在库尔德问题上提出过如下一些重要的“话语”或政策。2009年，土耳其政府公布“库尔德开放倡议”（Kürt açılımı），该倡议对库尔德人的语言文化权利、公民权利、地方政府权利等作出某些保障性规定。⁵2011年11月23日，埃尔多安在议会进行了1个小时的演讲，公开承认并为土耳其政府20世纪30年代所杀害的近万名库尔德人道歉，即德尔西姆道歉（Dersim Apology）⁶。

与本文提到的“新思维”关系最密切的是2015年3月23日埃尔多安在新落成的总统府就民族和宗教关系发表的重要演讲⁷。埃尔多安从1071年的曼齐凯特战役谈到20世纪初土耳其独立战争，回顾了土耳其族同库尔德族长期形成的兄弟情谊，指出两个民族命运休戚与共的关系。埃尔多安通过这篇演讲正式“收回”或者“修正了”他的“新思维”演说中的提法。他表示，自己

¹ “Kürt realitesini tanıyoruz,” *Milliyet*, 17 Ağustos, 2005, p. 16.

² “Kürt sorunu benim sorunum,” <https://www.hurriyet.com.tr/gundem/kurt-sorunu-benim-sorumum-341847> 【2020年10月25日】

³ 这个诗人是贾希特·塔兰奇（Cahit Taranc），诗句为“我想要一个国家”。

⁴ “Kürt sorunu benim sorunum,” <https://www.hurriyet.com.tr/gundem/kurt-sorunu-benim-sorumum-341847>

⁵ “The Kurdish Opening in Turkey: Origins and Fu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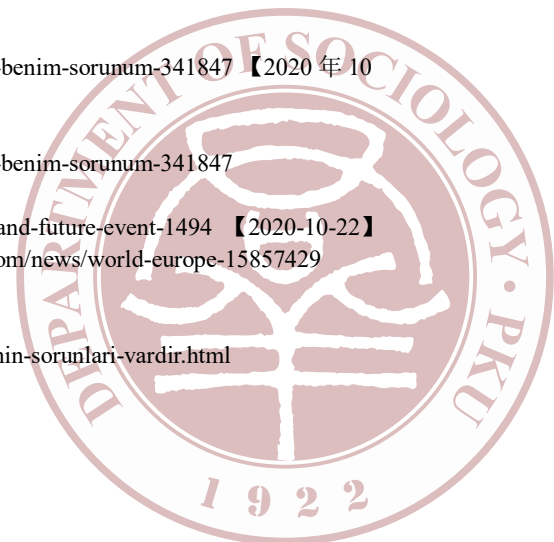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09/12/01/kurdish-opening-in-turkey-origins-and-future-event-1494> 【2020-10-22】

⁶ “Turkey PM Erdogan apologises for 1930s Kurdish killings,”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15857429> 【2020-10-22】

⁷ 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府网站，网址：

<https://www.tccb.gov.tr/haberler/410/29843/kurt-sorunu-yoktur-kurt-kardeslerimin-sorunlari-vardir.html>

【2020-10-22】



在 2005 年讲的是“库尔德问题”（Kürt meselesi），说土耳其不存在“库尔德难题”（Kürt sorunu）¹，库尔德人在生存和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包括土耳其族在内的其他公民也会遇到，并不因民族身份而具有特殊性。库尔德族是共和国诸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各个民族的首要身份应该是土耳其共和国公民。埃尔多安明确指出，民族是聚合在“同一片屋檐下”各个种族的共同体概念（Millet, her türlü etnik unsuru aynı çatı altında toplayan bir kavramın adıdır.），“土耳其民族”包括土耳其、库尔德、切尔克斯、格鲁吉亚、阿布哈兹、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等 36 个族群。埃尔多安进而提出“四个独一”理念，即“一个民族、一面旗帜、一个祖国、一个国家”（Tek millet, tek bayrak, tek vatan, tek devlet）。

从“新思维”至今，埃尔多安党人对库尔德问题的话语有某种逆转，或者说是收缩，这种收缩的原因与下文将提及的形势变化有关。收缩的表现就是越来越向主体民族的主流观念靠近和调整，把“库尔德问题”说成是“库尔德事务”就是最重要的表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埃尔多安党人回到了凯末尔主义的老路上，共和国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单一民族（族群）话语，已经转变为超越狭义族群身份、进而强调广义国民身份（Türkiyeli）的话语。根据本文的研究，这种话语的源头，实际上可以最早追溯到土耳其独立革命时期，但比较多的讨论应该是在厄扎尔时代，而在埃尔多安时代，这成为了一个既成事实。

库尔德人一向在地区冲突中是被不同方面所利用的对象。随着叙利亚局势的变化，PKK 的重要部分转移到了叙利亚。随着土耳其政府与阿萨德政权交恶，ISIS 的崛起，美国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支持，以及土耳其国内库尔德政党（人民民主党，HDP）的崛起威胁到正发党的选票，等等，这些因素都使得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又变得更加敏感了。科巴尼之战使得库尔德人对埃尔多安的失望逐步发酵。以库尔德人为主的人民民主党崛起，在 2015 年 7 月的议会选举中突破了 10% 的得票门槛，成为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个正式进入议会的库尔德党派。从得票结果来看，正发党丢掉的选票大多由 HDP 获得，这不仅在当时影响到了埃尔多安的修宪大计，更是探索出了库尔德人斗争的新道路，这让埃尔多安如坐针毡。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叙利亚的库尔德人趁机崛起，库尔德工人党将其重要力量转移到了叙利亚。²土耳其一方面坚持“巴沙尔必须下台”的政治主张，不承认叙利亚政府的合法性，支持叙利亚北部反对派武装与叙政府军抗衡；另一方面土耳其仇视和警惕叙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及其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军”，认为叙利亚“民主联盟党”与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都是“恐怖组织”³。2015 年 7 月，埃尔多安明确表示不接受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建国。与此同时，“民主联盟党”呼吁中东地区所有库尔德人保卫再次受到“伊斯兰国”组织威胁的科巴尼，随后，库尔德工人党也进入叙利亚支援“民主联盟党”，土叙两国的库尔德势力开始更为显著的合流。⁴

在人民民主党（HDP）崛起、以及土叙库尔德人联系越发紧密的大背景下，埃尔多安政府开始出手打击国内外库尔德势力。2015 年，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十年的所谓“和解进程”破产。为期两年的停火结束，而且土耳其政府表示不会再与库尔德工人党进行谈判。这标志着土耳其官方对库尔德问题的政治话语重新回到了国家安全优先的轨道。

总体来看，埃尔多安在 2005 年的主张虽然没有成为现实，但其仍代表了土耳其在库尔德问

¹ 但如前文所述，根据当时的土耳其新闻报道看，埃尔多安讲的就是“库尔德难题”（Kürt sorunu）。

² 王新刚主编：《叙利亚发展报告（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102-103 页。

³ 王新刚主编：《叙利亚发展报告（2019）》，第 100 页。

⁴ 在叙利亚问题爆发之初，一些叙利亚库尔德人试图联合伊拉克和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以获得后两者的支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土耳其尤其是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建国的主张。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叙利亚库尔德人最终走上与其他两国库尔德人不同的道路，即在承认主权完整的前提下寻求自治。参见王新刚主编：《叙利亚发展报告（2019）》，第 110 页。



题的认知和话语上的重大进展。正发党时期，虽然奥斯陆和平进程和伊姆拉勒和平进程都失败了，但也留下了厚重的历史遗产，代表了当代土耳其人在解决其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上的积极探索。

七、结语

土耳其是库尔德人口最多的国家，库尔德人在土耳其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它占据了土耳其总人口的约五分之一，数量高达 1,470 万人左右。¹ 尽管在奥斯曼帝国晚期，土耳其人就试图同化库尔德人，但并没有实现，反而强化了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库尔德人的存在一度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他们的身份被抹杀和压制，但这个问题无法永远地隐藏和搁置下去。在进入民主化时期之后，土耳其必然要面对库尔德问题，以往被淹没的要浮出来，被打压的要站起来，被忽视的要争取自己的权利。

从历史角度来看，土耳其政府为解决库尔德问题做了很多尝试，先是强硬同化，后来采取走民主和发展路径的策略。正发党政府尤其强调运用民主的手段，口号就是用更多的民主解决民族问题。从结果来看并没有成功，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既涉及权力和资源的重新分配，同时又触动了主体民族的敏感神经，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

从话语政治的角度来看，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从国族主义向认同政治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这或许是一个日益强调多元主义的时代难以摆脱的宿命。但土耳其又有其特殊性，尤其是表现在族称和国民身份上的长期混同。争论的各方各执一词，孰是孰非，难有定论。福山指出，身份政治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对国家和世界造成了巨大伤害，并呼吁重建国族认同以应对这一挑战。²

民族国家的兴起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扩张是近代历史的两个重要主题。前者主要是从西欧的历史经验中生长出来的，其扩散带来的是民族主义的思潮和运动此起彼伏、蓬勃发展，并直接导致传统帝国的纷纷崩溃与解体。然而，一族一国这样的民族主义逻辑并没有随着传统帝国的消失而失声。从内在逻辑来看，其是要不断地细化分裂下去，因为世界上只有 200 个左右的主权国家，而能够被称为民族或族群的群体却成千上万。冷战期间的两大阵营对峙格局暂时淹没了民族主义这个“病毒”的扩散，但在过去三十年里，以民族-宗教为载体的认同政治又在世界各地纷纷崛起，从美国某州闹独立，到苏格兰公投，以及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持续的独立冲动，更不用说世界上其他地区存在的民族分裂主义现实，我们都能够看出，民族主义给世界带来了诸多挑战。这也说明，既有的民族国家体系消化民族问题面临着根深蒂固的困境。因此，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反思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特别是其在此问题上的话语演变及其得失，显得尤为必要。

¹ “Son Nüfus - Dünyada toplam kaç Kürt var?” <https://www.rudaw.net/turkish/world/150620169> 【2020 年 10 月 25 日】

² Francis Fukuyama, “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in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8, Vol. 97, No. 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mericas/2018-08-14/against-identity-politics-tribalism-francis-fukuyama> 【2020 年 10 月 25 日】

